

中国古典诗歌选注

刘让言 林家英 陈志明 选注

中国古典诗歌选注

刘让言 林家英 陈志明 选注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典诗歌选注

(一)

刘让言 林家英 陈志明选注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插页2 印张19 字数430,000

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500

书号：10096·180 定价：1.92元



前 言

一

艺术起源于劳动，起源于人们的劳动实践。当人类为求得生活资料而进行集体的劳动生产时，艺术就随着产生了。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，我国的艺术活动，远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就已开始；到了新石器时代，各种艺术，特别是雕塑、绘画、雕刻等，已经普遍地出现。

我国诗歌的产生，也在遥远的原始社会时期，根据古书的记载，那时的诗歌大都和音乐、舞蹈结合在一起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说：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阕。”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记录古代诗歌的总集，《诗经》以前的古代诗歌，由于没有文字记录，大都没有留传下来。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虽然也记载了一些古代的歌谣，但是在这些歌谣中，有的显然是后人的伪托，有的可能是真实的，但在从口头进入文字的记录过程中，也经过记录者的改动和润色，很难显示出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。只有极少的一部分，从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，可能接近于原来的真实，如《弹歌》、《伊耆氏蜡辞》、《夏民谣》等。

《易经》是我国古代一部占卜用的集体创作，编纂成书可能在殷末周初，但其中的卦爻辞却保存了不少这个时期以前的歌

谣，给我们提供了欣赏和研究上古诗歌的宝贵材料。《易经》中卦爻辞的时代是极其复杂的，它包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前期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。这些歌谣从各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。

《弹歌》和《女承筐》这类作品，生动地表现了原始社会的生产情景。原始的诗歌和生产本来有着直接的联系，这些诗歌是原始社会狩猎和畜牧生活的真实而直接的反映。《雷震谣》真实地表现了原始人们在自然面前的畏惧和虔敬。《伊耆氏蜡辞》是对农业丰收的祝愿。这些诗歌也真实地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风习，如在《屯如》、《乘马》中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部落间的抢婚习俗。原始社会各部落间是经常进行战争的，这在那时的诗歌中也得到反映，如《得敌》这首短歌，就是对战争胜利的如实描写。进入奴隶社会以后，阶级对立出现了，于是就产生反映阶级矛盾的诗歌。记录在《尚书·汤誓》中的《夏民谣》，就是奴隶对奴隶统治者的残暴压迫和统治的愤怒反抗。夏桀这个残暴的奴隶统治者，曾把自己比作不落的太阳，夸耀他的统治是永久的，可是奴隶们却诅咒他早日灭亡，表现了他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。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，是上古歌谣的一个主要特征。这也说明我国诗歌从它萌芽产生的时候起，就是具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的。

当然，上古歌谣还是萌芽状态的诗歌，和后来的诗歌相比，自然还显得幼稚，不够成熟，但它那原始的质朴的思想感情，单纯朴素的表现形式，给人一种深厚朴实的感觉，显示了原始诗歌所特有的感人的艺术魅力。

殷墟卜辞的出现，给我们研究上古歌谣提供了可贵的材料。卜辞是殷王朝后半期（公元前14世纪——前11世纪）的占卜的记

录，它本身不是诗歌作品，但从它的一些类似诗歌形式的文字如《今日雨》来看，可以推想我国古籍中所记载的一些上古歌谣，是可信的。卜辞中有关舞蹈和音乐的记载很多，这说明乐、舞在那时的盛行。乐、舞和诗歌在古代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因此，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大量的诗歌存在，可惜由于没有记录下来，都已经亡佚了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一份最珍贵的文学遗产，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度成熟。《诗经》包括了从西周初期（公元前11世纪）到春秋中叶（公元前6世纪）五百多年间我国诗歌创作的成果，它所产生的年代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高度发展，以及由盛到衰和崩溃瓦解的时期。《诗经》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生活面貌。

《诗经》的三百零五篇作品，时代最早的是《周颂》，它是西周前期的作品。《大雅》中的大部分诗篇，也作于这一时期。《小雅》大部分是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的诗作；十五国风大多是东迁以后写作的。《鲁颂》是歌颂鲁僖公的诗，《商颂》是歌颂宋襄公的诗，也都是春秋时期的作品。

周武王灭商（约公元前1027年）以后，鉴于殷商的灭亡是由于奴隶主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，众叛亲离，所以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，来进一步加强奴隶制，巩固其统治地位。他分封了一些王室的兄弟子侄、同姓贵族和异姓的功臣贵戚为诸侯；在经济上利用灭商得来的大量奴隶，大力发展农业。周公执政期间，进一步扩大和推行这一政策，并制定了严密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，平定了武庚（殷纣王的儿子）和东南地区的叛乱。后来又经过成王、康王的继续经营，西周的奴隶制更加巩固和发展，呈现出一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，形成历史上所谓的

“成康之治”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周颂》和《大雅》中的一些历史叙事诗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。《周颂》是周人祭祀祖宗和神灵的乐歌，在这些诗歌中显示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对他们统治“成功”的欢欣和骄傲。《大雅》中的历史叙事诗如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绵》、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等，也都是对祖先的业绩和功德的歌颂。《生民》是歌颂周族的始祖后稷的，诗中描写后稷的诞生、成长和他对农业上的贡献，富有浓厚的神话色彩。《公刘》是对后稷的曾孙公刘的颂歌，《绵》是歌颂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诗，他们都是对周族的发展有极大功绩的人。《皇矣》和《大明》也是记述周朝开国历史的诗篇，是对文王和武王的盛德的歌颂。这些诗篇是周族的史诗，是研究周族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；同时，这些诗的描写也极生动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但是，在灭殷以后不久，周族的统治者就忘记了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，开始腐化堕落，追求奢侈享乐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中的一些饮宴诗和田猎诗，就是这种贵族糜烂生活的反映。

昭王、穆王以后，周朝的奴隶制开始衰落，到了厉王、宣王和幽王时代，已面临崩溃的局面。这时阶级矛盾，民族矛盾，以及奴隶主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都日益尖锐，结果导致了西周的灭亡。平王东迁以后，周王朝的统治力量更为衰弱，诸侯互相攻伐，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（公元前770年—前403年）。春秋时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，阶级斗争更为激烈。长期的政治动乱，不但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，生活更加困苦，就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，特别是那些统治阶级中的下层人物，也因政治动荡，生活不安，而对国家和自己命运的前途感到无限的忧虑和恐惧。这种思想感情，在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的一

些贵族讽刺诗中，强烈地表现出来。《大雅》的《板》、《荡》就是讽刺周厉王的暴政的。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更直接地指责周幽王的宠臣们和宠妃褒姒的擅权，以及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。

《大雅·桑柔》揭露了在动乱中人民的离散丧亡。《小雅·正月》慨叹贫富间的苦乐不均。《小雅·北山》是对贵贱之间劳逸不均的怨言。《小雅·大东》更以“东人”和“西人”作对比，写出东方诸侯国家对周室过度剥削榨取的不满。其他如《大雅·瞻卬》、《小雅·节南山》、《小雅·雨无正》、《小雅·巧言》等，都是这类的作品。这些感时伤世的作品是时代动荡、政治混乱的反映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的黑暗。当然，这些贵族讽刺诗在反映阶级矛盾、政治黑暗方面，是有很大的阶级局限的，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。

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中的民歌，是《诗经》的精华部分。这些民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思想 and 感情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在一些民歌如《邶风·七月》、《魏风·伐檀》中，无情地揭露了奴隶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奴隶主不劳而获，奴隶们终年辛苦劳动，却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温饱。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诗中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控诉。在《魏风·硕鼠》、《小雅·黄鸟》中，诗人把奴隶主们比作大老鼠，比作黄鸟，进行了尖锐的讽刺。奴隶们在无可忍受的剥削和压迫下，生活不下去，只好逃亡，去寻求想望中的乐土；可是逃出大老鼠的剥削，又遇到了黄鸟，哪里也找不到可以生活下去的地方。这里充分地暴露了奴隶制社会的残酷和不合理。除了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外，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。统治阶级的诸侯们，为了争夺

霸权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，迫使人民离乡背井，去服兵役、徭役，使他们长年在外，不能和家人团聚，田园荒芜了，全家生活无着，陷入困苦的绝望境地。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、《小雅·采薇》、《唐风·鸛羽》、《豳风·东山》等，都是控诉这种生活的佳作。诗中也有歌颂正义的战争和爱国主义的诗篇，前者如《秦风·无衣》，后者如《邶风·载驰》。也有一些诗是对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和残暴行为的讽刺和揭露。如《邶风·新台》、《陈风·株林》是揭露卫宣公、陈灵公的荒淫生活的；《秦风·黄鸟》是对奴隶社会殉葬暴行的强烈抗议。《诗经》中有许多民歌是歌唱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的。爱情诗在《国风》中占着重要的篇幅。这些诗歌内容丰富，题材多样，表现手法灵活多变，极富民歌清新明快的特色。如《周南》的《关雎》、《汉广》，《邶风》的《柏舟》、《静女》，《郑风》的《将仲子》、《狡童》、《溱洧》，《陈风》的《东门之枌》、《日出》等，都是这类诗歌的名篇。也有一些描写弃妇的不幸生活的诗，如《邶风·谷风》、《卫风·氓》等，从生活的一个侧面，暴露了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命运悲苦。也有一些诗歌，如《周南·采芣苢》、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等，是对人民的劳动生活的描写。《诗经》具体生动地、多方面地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的广阔的生活面貌，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最宝贵、最真实的材料。

《诗经》的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。它的句式基本是四言，但也有二言、三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的句式。句式的多变化，给诗的表情达意，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。《诗经》的韵律自然谐和，重章叠句、双声叠韵的运用，不仅增强了诗的音乐美，而且使诗的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。比兴手法的运用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绘塑造形象，使诗的形象逼真、生动感人，更是《诗经》鲜明

的艺术特色。《诗经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宝贵遗产。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，真实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，高度的艺术技巧，使《诗经》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奇伟的高峰，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。这对后来诗歌的发展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诗人。他的诗歌后人称为“楚辞”，这是汉代人所给予的名称。“楚辞”的本来意义就是楚人的歌辞，作为一种诗歌的体裁来说，它的特点是“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（宋黄伯思《新校楚辞序》），是一种新的富有独特风格的诗歌形式。早在屈原以前，楚地的民歌已很盛行，在《诗经》的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，就有江汉流域的民歌。相传为公元前六世纪的《越人歌》和《徐人歌》，都出在楚国的邻邦；《沧浪之水歌》更是真正的楚国歌谣。屈原继承和发扬了《诗经》的优良传统，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，创造了“楚辞”的新诗体，把我国诗歌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屈原的诗歌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方面来说，比《诗经》都有显著的发展，它深化了诗的内容，想象丰富，感情奔放，语言丰富优美，大量采用神话传说，形式多样而富于变化，所有这些，同《诗经》比较起来，都是很不相同的。

屈原的作品，按照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是二十五篇。大都保存在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里。关于屈原作品的篇目，过去曾有过不同的说法，现在可以认定为屈原的作品的，有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和《招魂》。《九歌》是屈原根据楚国民间的祭神乐曲和神话传说，为楚宫廷演奏而创作的一组祭神舞曲，从思想内容和形式风格来看，应该是屈原早期的作品，可能是在他任左徒期间写作的。《离骚》作于遭谗被疏以

后。《天问》是放逐江南期间的作品。《九章》的九篇作品，班固、王逸都说是屈原放逐江南后所作，这话并不确切。《九章》不是一个时期写成的，《橘颂》写作时期最早，是他青年时期的诗作；《惜诵》可能作于遭谗被疏的初期；《抽思》是屈原流放汉北时的作品；《思美人》也作于这一时期，时间可能比《抽思》稍晚。《九章》的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怀沙》、《惜往日》、《悲回风》五篇，都是流放江南后的作品。《涉江》叙述了诗人流放中的行程，《哀郢》哀叹郢都的陷落，《怀沙》是诗人最后的绝命辞。《招魂》一篇，是屈原为招怀王的魂而作，当作于怀王被扣留而死于秦国之后。

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（公元前403年—前221年）的末期，这时我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，是斗争极为激烈的时代。这时的楚国正遭受到秦国的严重威胁，屈原对内主张“举贤授能”，实行法治，使国家富强；对外主张联齐抗秦，保全楚国，进而统一中国。在当时来说，这些主张，是符合楚国的利益，也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的。可是，他的主张却遭到贵族统治集团的坚决反对，使他遭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，终于悲愤而死，楚国也因此而灭亡。这是屈原的悲剧，也是楚国的悲剧。屈原的悲世嫉俗、忧国伤时的诗篇，与这历史的悲剧，与屈原的不幸的政治遭遇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屈原是伟大的政治诗人，他在诗中一再表达他的政治理想，在《离骚》中提到“举贤而授能”，在《惜往日》中赞美过“明法度”，“国富强而法立”。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的，因而必然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反对。他对腐朽的贵族集团，深恶痛绝，对他们的庸俗、奸邪、谄佞和无能，在许多诗篇里给予无情的讽刺和揭露。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，他把

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、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。这种精神在青年时期的《橘颂》中已有萌芽，后来在长诗《离骚》和《抽思》、《哀郢》等篇中更给以突出的表现。“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”（《离骚》），他不怕自己遭殃，担心的只是国家覆灭。他痛恨那群贵族，是因为他们使国家陷于幽暗和危险的境地。他流浪在外，一时也没有忘记郢都；郢都陷落时，致使他哀痛欲绝。诗人时时牵挂着人民的困苦，在郢都陷落时，他为人民的流离失所而哀伤。甚至当他在极端痛苦中想要去国远游时，由于眷恋故国，不忍离开人民，他还是在矛盾的痛苦中留下了。

“鸟飞反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”（《哀郢》），他死也不忘故国，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！屈原在诗里还突出地表现了他那坚贞不屈的倔强性格。他光明正大，刚直不阿；睥睨那些苟苟营营的小人，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；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”（《离骚》）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就是遭受“体解”的酷刑也决不屈服，这是多么坚贞的人格。正是表现在诗中的远大的政治思想，高度的爱国激情，以及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，使屈原的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，成为千古不朽的杰作。

屈原诗歌的突出的艺术特色，是它的浪漫主义精神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中，指责屈原的诗诡异、譎怪、狷狭、荒淫，不合经典，不知这正是屈原浪漫主义精神的特色。屈原想象力丰富，善于运用想象和联想，把神话传说融合于诗的内容，使他的诗具有奇幻的色彩，形象鲜明动人。他的诗构思奇伟，描写细致深刻，常常通过景物描写抒发感情，刻画人物性格，使情景交融，给人以深刻的感受。他的诗形式自由，用韵自然。他善于向民歌学习，善于运用民间的方言土语，使诗的语言丰富多彩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。

屈原在政治上是失败者，但却是卓越的诗人。他的作品对我国诗歌的发展，影响极为深远，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，无不从他的诗作里吸取艺术技巧和创作经验；特别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，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更大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里说他“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”，这话是不错的。

二

西汉、东汉前后四百余年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20年）间的诗歌创作，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是乐府民歌。被后世称为“古诗”的五言诗，是这一时期中文人诗的最优秀代表。

汉武帝时，经过高祖、文、景几代的休养生息，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。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，武帝励精图治，崇尚文治武功。他对外用兵，平息北方匈奴的边患，结束南方部族的纷争。他排斥百家，独尊儒学，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，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关乐府，制作并搜采乐曲和歌辞。现存的乐府歌辞，一部分是文人的创作，另一部分是从民间搜采来的民歌。武帝时，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参与乐府歌辞的创作，作品有《郊祀歌》十九章等，主要用于朝廷典礼，内容不外是皇帝对天地鬼神言志，都是些应景文字，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。从民间搜采来的歌辞，即后人称为乐府民歌的那一部分诗作，主要用于普通场合演唱，供统治阶级消遣娱乐和了解民情之用。由于乐府民歌的作者是处于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，他们“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因而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崭新的艺术特色。如果将上述两类乐府歌辞与《诗经》相比较，乐府民歌与《诗经》的十五国风大体相当，文人创作的乐府诗与《诗经》

的雅颂大致相近。

乐府机关搜集民歌的地域很广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民歌采集地，北至燕代，南达南郡，东到淮南，西抵陇西，遍及黄河上下，长江南北。《艺文志》著录的西汉民歌共一百三十八篇，可惜多数都失传了。从史书记载看来，东汉时乐府机关继续实行着采集民歌的制度。现存两汉乐府民歌共数十首，其中东汉时采集的占多数。这些民歌，在宋代郭茂倩编的《乐府诗集》中分别列于《相和歌辞》、《杂曲歌辞》和《鼓吹曲辞》三类中。前两类中的民歌是乐府诗中的精华。《鼓吹曲辞》中的汉代《铙歌》十八篇都是西汉时的作品，其中一部分是民歌。此外，在《乐府诗集》的《杂歌谣辞》一类中，也有汉代的民间歌谣；这些作品，虽然不是乐府机关采集入乐的民歌，但都来自民间，性质上与乐府民歌是一致的。在研究两汉乐府民歌时，对于《杂歌谣辞》中的作品，也应该给予适当的注意。

两汉乐府民歌在思想内容上继承了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的传统，相当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两汉的现实生活，真实地再现了人民群众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。两汉自武帝开始，对外战争时断时续，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都很深重。乐府民歌形象地展现了人民的悲惨境遇以及他们的不平与抗争。例如，《十五从军征》写一个军士从十五岁从军，到八十岁才免于服役。当他回家时，家园残破荒凉，亲人都已长逝。《战城南》通过写战死以后乌鸦啄食尸体，表示了对战争的悲愤的抗议。《平陵东》写官吏绑票，敲诈勒索，使人倾家荡产。《枯鱼过河泣》写一条鱼因行动不慎被人捉去晒干，它因此告诫同伴要接受这一教训。这首诗用寓言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社会政治的黑暗。而当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踏上武装反抗的道路。《东门行》中的主

人公便是因为无衣无食活不下去，只好痛下决心，带剑出走，准备武装反抗。乐府民歌对于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也有所反映。例如，《陌上桑》写太守调戏采桑女罗敷的故事，在歌颂罗敷的美貌与坚贞的同时，也暴露了太守的丑恶灵魂。

《孤儿行》写一个上层家庭中的孤儿备受兄嫂的虐待。当父母在世时，他过着“乘坚车，驾驷马”的富裕生活。父母去世后，他沦为兄嫂的奴隶，缺衣少食，外出行贩，在家服役，从做饭、喂马、挑水到养蚕、种瓜，无所不做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想起要给死去的父母写信，诉说自己的痛苦。这首诗所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家庭，但对整个剥削阶级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。

在两汉乐府民歌中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，便是抒写离情别绪与诉说男女情爱。前者如《悲歌》、《高田种小麦》。《悲歌》写流浪他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，“欲归家无人，欲渡河无船”，羁旅的哀愁是可以想见的。《高田种小麦》以“高田种小麦，终久不成穗”作比喻，抒发“男儿在他乡，焉得不憔悴”的深长感慨。

下层人民的流离飘泊，不外乎徭役、赋税和灾荒的驱迫，所以，这些看来是抒写个人感情的作品，归根结底仍然是时代动乱和人民苦难的反映。乐府民歌中有关爱情和婚姻的诗有好几首，多数用女主人公的口吻来表现。《上邪》写女子以海枯石烂的盟誓表白自己坚贞的爱情，感情强烈奔放，抒写淋漓尽致，是古今情诗中少有的名篇。《有所思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上山采蘼芜》写男子的负心，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不幸和痛苦。

两汉乐府民歌在艺术表现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。上面提到的《十五从军征》、《陌上桑》、《孤儿行》、《上山采蘼芜》等，以及后面即将论及的《焦仲卿妻》，都是诗史上的叙事名篇。总计两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，约在十五篇以上。这些

诗成功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形成了我国古代诗史上叙事诗创作的一个高潮。

西汉前期的乐府民歌，形式多种多样，有四言诗，有五言诗，也有杂言诗。汉初的《公无渡河》、《善哉行》是四言，《孤儿行》、《满歌行》以四言为主，汉初的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和武、宣时代的《饶歌》十八曲都是杂言。晚出的乐府民歌，五言诗逐渐成了主要形式。这是我国古代诗歌经《诗经》的四言诗与楚辞的骚体诗之后，在诗歌形式上的又一重大发展，对于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。

产生于东汉末年的长篇叙事诗《焦仲卿妻》代表了两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。这首诗共有三百五十七句，是《离骚》以后篇幅最长，也是最伟大的诗篇。两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叙事的方法，五字句的形式，在这首诗中得到了统一的体现。诗篇采用五言的形式，完整地叙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这一对年轻夫妇的爱情悲剧，成功地塑造了忠于爱情、勇于反抗的兰芝夫妇的形象，有力地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罪恶。诗篇结尾写兰芝夫妇殉情以后合葬在一起，墓地上松柏梧桐枝叶相连，林中鸳鸯鸟相对鸣叫，这一浪漫主义的结尾表达了人民对于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。这首诗由于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人民鲜明的爱憎感情，千百年来成了反抗封建传统的有力武器，直到提倡反封建的新文学的“五·四”时期，还出现过以此诗为蓝本的四种话剧剧本。在艺术表现上，《焦仲卿妻》的最大成功在于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兰芝、仲卿生活在焦母、刘兄、太守、县令等组成的特定的环境中，被这一群代表了封建宗法恶势力的丑类包围着，悲剧的结局是势所难免的。兰芝、仲卿虽然同为封建恶势力的牺牲品，但作为艺术形象，并不彼此雷同。各自以独特的语言、行为

显示了彼此不可重复的独特个性。作品在情节提炼、结构安排、语言运用等方面也都很成功。总之，长篇叙事诗《焦仲卿妻》的出现，标志着五言诗的发展已走向成熟的阶段。

两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继《楚辞》以后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，它有如奇花异葩盛开在两汉寂寞的诗歌园地里。它的出现，不仅为我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，而且还给后世诗歌创作以深远的影响。它的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的精神，运用叙事方法与采用通俗语言的艺术表现，无不给后世文人以巨大启发。这从建安时代曹操、曹植、王粲、陈琳等描写人民苦难和离乱的诗作中，唐代杜甫“因事立题”的叙事名篇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等篇中，白居易、元稹的“新乐府”、“新题乐府”以及中唐其他诗人的优秀诗篇中，都可以清楚看出两汉乐府民歌所起的积极作用。

两汉时代有主名的诗歌创作，在东汉以前除了《垓下歌》（项羽）、《大风歌》（刘邦）及《招隐士》（淮南小山）等少数几篇骚体诗外，几乎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作品。所以，从文人诗的创作来说，西汉实在是一个中衰的时期。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作家文学衰落以后，常常要依靠民间文学的营养才能重新振兴起来。汉代自武帝开始设立乐府，采集民间歌谣，使五言形式的民歌有机会登上大雅之堂并得以广为流传。民歌独特的思想内容，更加接近口语的五字句的节奏，对于寂寞的诗坛不能不产生强有力的刺激作用。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，到东汉明帝时，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开始出现了。文人五言诗与五言的乐府民歌的差别在于，前者是不入乐的文人创作，后者是合乐的民间创作。现在见得到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应亨的《赠四王冠》和班固的《咏史》。这些诗作，技巧生硬，还停留在草创时期的